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六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 四二六五 次会议

2001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举行
纽约

- 主席:** 马布巴尼先生 (新加坡)
- 成员:** 孟加拉国. 乔杜里先生
 中国 沈国放先生
 哥伦比亚. 巴尔迪维索先生
 法国 莱维特先生
 爱尔兰 库尼先生
 牙买加. 普伦德加斯特先生
 马里 图雷先生
 毛里求斯. 尼武尔先生
 挪威 布拉特斯卡先生
 俄罗斯联邦 格拉诺夫斯基先生
 突尼斯. 本·穆斯塔法先生
 乌克兰. 克罗赫马尔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尔登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瑟德贝里女士

议程项目

东帝汶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的报告 (S/2001/42)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78)。

上午 10 时 25 分开会

就印度和巴基斯坦受到的地震而向两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

主席（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代表安理会就今天在印度西部发生的造成大量毁坏和生命损失的地震而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深表哀悼。我相信安理会成员在该问题上与我有同感。

向美国代表团离任法律顾问告别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还谨借此机会向美国代表团法律顾问鲍勃·罗森斯托克先生告别。罗森斯托克先生自 1964 年以来就任职于美国代表团。我的理解是 1964 年联合国有 115 个成员国。今天，有 189 个。数以百计的代表来来去去，但鲍勃一直留下来就对我们大家都如此重要的问题进行工作。我可以确信地这样讲，因为当我在 1984 年至 1989 年作为大使而首次来到这里时，罗森斯托克先生已经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应该知道，这个会议室里的每个人在他走后会怀念他。我希望安理会成员与我一道向一位与我们一起 37 年的同事鼓掌告别。

我请罗森斯托克先生发言。

罗森斯托克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非常感谢你这一令人非常感动的评价。我看到发言者比我多年来看到的还多。所以我将十分简短，谨再次对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不同寻常的姿态深表感谢，他们一反寻常地鼓掌，这更令人高兴，我当然不对此提出程序问题。再次感谢你们。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东帝汶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的报告（S/2001/42）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澳大利亚、巴西、智利、斐济、日本、印度尼西亚、

莫桑比克、新西兰、菲律宾、大韩民国和瑞典代表的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经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及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温斯利女士（澳大利亚）、维奥蒂先生（巴西）、巴尔德斯先生（智利）、奈杜先生（斐济）、小林先生（日本）、维比索诺先生（印度尼西亚）、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麦凯先生（新西兰）、马霍洛先生（菲律宾）、金先生（大韩民国）和肖里先生（瑞典）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其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鉴于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及东帝汶过渡时期行政长官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先生。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根据在安全理事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并鉴于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负责外交事务的东帝汶过渡内阁成员若泽·拉莫斯-奥尔塔先生。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拉莫斯·奥尔塔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根据在安全理事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并鉴于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大会主席哈里·霍尔克里先生。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哈里·霍尔克里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的席位上就座。

根据安理会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署长马克·马洛赫·布朗先生、世界银行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太平洋岛屿国家主任克劳斯·罗兰德先生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和太平洋部顾问路易斯·巴尔迪维索先生参加会议。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布朗先生、罗兰德先生和巴尔迪维索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理会是按照它在事先磋商中达成的理解举行会议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东帝汶过渡当局）2000 年 7 月 27 日至 2001 年 1 月 16 日期间的报告，即 S/2001/42 号文件。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 S/2001/83 号文件，其中载有葡萄牙总统 2001 年 1 月 25 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一封信。

我还谨指出，鉴于这次公开辩论举行的时间、鉴于我们预计将延长东帝汶过渡当局的任务期限以及鉴于我们今天上午将有许多知名人士讲话，其中包括大会主席哈里·霍尔克里先生、若泽·拉莫斯-奥塔先生（我相信他是第一次在安理会讲话）和马洛赫·布朗先生以及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这次辩论预示将是一次着眼于未来的前瞻性辩论。我们相信，这次辩论将使我们有机会开始共同勾画今后东帝汶向独立过渡以及独立后的前景。我们还应讨论国际社会在帮助东帝汶实现这一前景方面应发挥何种作用。

我现在请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比埃拉·德梅洛先生发言。

比埃拉·德梅洛先生（以英语发言）：在通过第 1272（1999）号决议十五个月后，这是我在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东帝汶过渡当局）目前任务期间最后一次作情况介绍。因此，在这次会议上，当我们审视我们所走过的路和今后即将走的路时，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坚持不懈地注意并支持我们在东帝汶的工作，在最近几个月里这或许最清楚地表现在安理会决定派出一个特派团以审查安理会第 1272（1999）和第 1319（2000）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主席先生，我还谨赞赏地注意到你作为安理会现任主席努力组织这次重要的辩论，使一些重要的行动者今天在这里聚会一堂，其中包括大会主席，我们有幸就在几个星期前在东帝汶接待了他。在安理会这个月繁忙的议程上东帝汶问题被放前列，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新加坡为此进行了准备工作，包括向地力派出一个代表团对当地情况进行调查，这是一种我们都应钦佩的模范做法。我尤其表示感谢。

最后，我的朋友和同事，东帝汶负责外交事务的内阁成员若泽·拉莫斯-奥塔也将在这里向安理会介绍情况，尽管我无需介绍他，但关于他我还是要说几句话。今天我们将向安理会介绍我们对特派团已作的结构性变动，最主要的是变动是通过事先确定一个有效力的东帝汶政府的构成。因此在过去 25 年里最具献身精神和最著名的发言人今天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是非常合适的。我谨感谢安理会邀请他前来发言。

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对东帝汶过渡当局提出的独特要求意味着我们的任务是不轻松的，尽管我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们的任务将会多么复杂。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1272（1999）号决议为东帝汶过渡当局规定的任务的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涉及维持和平和人道主义援助，这些任务可能比过去要求完成联合国的任务更传统，并且涉及管理东帝汶和使东帝汶获得独立的全面的行政和立法责任，包括司法方面。

联合国要求东帝汶过渡当局在一个刚刚有过极其惨痛经历的国家执行这项任务。我感谢秘书长在他

的报告中向东帝汶过渡当局取得的成就表示敬意，但我知道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才能达到人们对东帝汶过渡当局的到来所寄予的很高的期望，对此我没有抱任何幻想。尽管过去一年中我们迈出了大步，我们的总体工作远未完成，甚至在诸如基础设施重建这样的关键领域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保健和教育方面，至今我们的工作离要求还差得很远，令人感到忧虑。此外，在其他一些方面，诸如能力建设，我们的任务才开始执行，要很多年后才能完成。正是在这种现实的意义上，东帝汶将需要国际社会继续承担起责任，今天我要让安理会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

关于在今后一年可取得什么成就，必须以向独立过渡的迅速发展的政治进程为背景来看这个问题。这个进程的核心是，确定东帝汶政府的结构，尽管是过渡或临时性质的。进行这项工作可通过组成其绝大多数成员是东帝汶人的内阁并逐渐把行政权力移交给这个机构，以及通过建立我们称为全国委员会的完全由东帝汶人组成的最初的立法机构，来扩大协商机制。在使所有各级的政府稳步东帝汶化以及建立东帝汶司法机构的同时，我们在走一条我认为是最有效、最直接和最有创新性的道路，这条道路将使我们完成我们的一项核心任务，或许是中心任务，这就是使东帝汶为自治作好准备。

我们最初的东帝汶过渡当局模式是，使这个机构东帝汶化，但到选举后再进行政治过渡。这个模式现已日臻完善，因而东帝汶人现已承担了过渡进程的很大一部分、或甚至大部分责任。只有让各机构延着东帝汶人的参与日益扩大的方向发展，我们才算走上了最可能建立持久而稳定的政府结构的道路。我们的目的是确保在整个任务过程中逐渐向自治过渡，而不是在获得独立的那一刻突然实行自治。

由于东帝汶过渡当局已参与创立一个新政府的独特任务，它事实上已不再被视为一个国际过渡性行政机构，而是为处于萌芽时期的东帝汶政府和其他国家机构提供支助的机构。东帝汶的这些机构仍在发展中，但我们不应怀疑它们确实存在。我在开始发言时

说过，今天东帝汶外交部长（可以这样称呼他）出席会议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事实。这并非总能轻而易举地产生结果；例如，内阁中关于我们上星期通过的政党条例的辩论往往旷日持久，需要通过妥协来解决问题。此外，现在我们已真正把权力分开了，我们不能保证全国委员会同内阁在所有问题上都会意见一致。在东帝汶过渡当局达到时尚不存在的司法部门也继续面临各种初创时期的问题，对此我们能理解，但问题相当严重。然而，只有通过在实践中、而不是在理论上进行准备工作，才能真正奠定自治的基础。东帝汶过渡当局执行其任务的这种概念和结构上的转变是我们努力执行第 1272（1999）号决议的基石。

我们面临另一个复杂问题，我们并非总能象我们希望地那样有效地处理这个问题，这就是必须使传统的维持和平做法适应现代的多方面治理任务。在筹资方面尤其如此。我不打算详细谈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只需说，我感谢安全理事会特派团在它去年 11 月的报告中注意到这种困境，并感谢它敦促以更灵活的方式使用联合国的资源。同样，我还感谢秘书长在其最近报告中提出同样意见，并感谢大会主席在这方面予以支持。

东帝汶过渡当局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特派团。它展示了一个普遍问题，即如果要使安全理事会的愿望得到满足，各项规则和程序就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第 1272（1999）号决议规定的多项重要任务现在都由东帝汶的新政府机构负责执行，而不是最初设想的那样由东帝汶过渡当局承担。我们不能指望政府在无法利用东帝汶过渡当局数目大许多倍的资源情况下，仅靠我称之为“残酷的”5 900 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充分执行这些任务。

最后的过渡阶段就在我们面前，就各政治步骤的细节即将作出关键决定，这些步骤将根据我曾在 11 月份在这里向安理会概述的总进程导致独立。我相信何塞将就这个问题做更多的阐述，但我们确实知道，选举将在 2001 年中期举行。的确，全国委员会政治常务委员会已在就选举时间表和选举框架举行听证，

看来正在形成一种共识，赞成在 8 月 30 日举行选举，同时建立一种结合直接地区代表和全国比例代表的选举制度。最后决定将不久在全国委员会 2 月 12 日召开续会之后作出。选举的目的是成立制宪议会，该机构的核心任务是制定宪法，并很可能同时在剩余过渡期内承担立法职能。

议会将在其审议工作中始终广泛征求大众对制宪问题的意见，东帝汶过渡当局将为制宪工作提供便利和支持，但这项工作将由东帝汶人来进行。所有以后的情况仍不甚明了，东帝汶人自己将在这一创始民主行为基础上填充该画面，但勿庸言，在结束第 1272 (1999) 号决议及其以后各项决议工作过程中，确实要加紧同安理会的协商。东帝汶过渡当局而非东帝汶政府仍将对确保选举完全自由和公正负有充分责任，但以后怎么办——例如是否举行总统选举或制宪议会是否在独立后转变成东帝汶的第一个立法机构——这不是我们应作的决定，因为只有东帝汶人自己才能适当地作出这些决定。

但显然，在实现独立后仍需要国际人员提供技术援助、进行能力建设并提供保障。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是，在所有关键高技能领域，培训人员都需要很长时间，因此，东帝汶的外科医生同任何其他外科医生一样都需要五至七年培训时间，而目前只有一名外科医生。现在国家需要的其他技能也需要许多年才能掌握。不可能有任何捷径或快速解决方案。例如，基础设施司认为，虽然有可能较快建立完全由东帝汶人任职的水域和港口服务处，但管理现代电信系统所需的技能则需要较长时间学习，在此期间必须提供国际支持。

再举一个例子，缺乏律师是东帝汶近代史给东帝汶留下的许多后遗症之一。虽然已为建立司法制度作出巨大努力，但正如安全理事会代表团自己指出的那样，这些努力仍仅仅触及表面。以边境管制为例，虽然已创建东帝汶边境事务处，但它仍处于初级阶段，东帝汶已经十分贫乏的国库因同西帝汶边界的跨界

货物走私而失去的重要的税收。我们也必须在这方面重视我们独立以后的各项努力。

秘书长已在其评论中阐明我们对东帝汶过渡当局撤出后生活的初步想法，并表明必须浑然一体地向其继任特派团过渡。目前正在从事更多的工作，以便制定一项完全充实的提议。我们打算为今年 6 月在堪培拉召开的下届捐资国会议及时制定该提议，并在秘书长就东帝汶问题向安理会提出下一份定期报告之时——或安理会可能决定的任何其他时候——同安理会详尽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该特派团要完全实现一体化，并避免竞争、重复和混乱，就必须在筹备该特派团过程中进行协调。必须在联合国内部和联合国同其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各捐资国、你们安理会、当然还有主要当事方东帝汶人之间进行协调。现在应该强调的是——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充分强调——东帝汶特派团的成功之一在于上述各方彼此进行了高度合作和团队合作，而且通过这种合作，整体已经比其各部分之总和大多。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实现同样的目标，这种团结已经通过我们的工作展现出来。因此，特别恰如其分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表对各部门重建和复兴至关重要的所有机构——和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都将在这里举行的本次辩论中发言。

但是，目前尚无法得到确切的细节。出现这种不确定性有若干原因。

第一，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包括独立日期在内的政治时间表还没有最后确定。

第二，可以保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根本取决于独立的东帝汶能够得到的预算资源——特别是国外投资产生的以及帝汶海石油及天然气资源产生的资金。就后者而言，虽然目前阶段无法作出确切估计，但我们知道东帝汶有权得到的石油用不了太长时间就会产生数倍于东帝汶目前预算的收入。因此，就这个问题同澳大利亚的谈判对确定东帝汶今后财政独

立的程度至关重要。令我感到乐观的是，有可能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就这里涉及的许多复杂问题达成协议。

第三，独立东帝汶当选政府完全可以决定大幅调整其政策，这将是它的一个特权，这项调整工作需要独立后对每个部门和政府机构所需的技能和人员进行重新评估。

司法是值得强调的一个领域，我曾在上次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同时对安全理事会代表团报告表示关切——时，强调困扰司法部门特别是调查 1998 年 8 月全民协商前后期间所犯严重罪行的关键领域的资源制约。我当时曾呼吁安理会增拨资源——我今天再次发出这项呼吁。我们仍在忍受一种充满危险的局势，甚至缺乏翻译人员也会使审判被迫拖延。

这不是说在起诉严重罪行被告方面没有取得进展：第一份侵害人类罪起诉书已于 12 月 12 日提出。实际上，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我甚至在今天上午看到包考法院也已对一项侵犯人类罪作出第一项判决。但这个进程亟需紧迫注入额外资源。严重犯罪调查股建立的目标调查数目给要审判的案件数目规定了实际限制。我们不能因进一步削减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目标而冒险使大众伸张正义的要求危险地无法得到满足。

东帝汶的技术基础正在迅速发生变化，这是难以确切估计东帝汶未来需要的另一个原因。在东帝汶有限的人力资源服务方面已经出现了很大的竞争。为加强这一资源库，我们仍在争取移民社群，尽管这样做收效还不大。这一资源库也在转变，越来越多的东帝汶人开始面对就业的挑战。东帝汶化、东帝汶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开办，我们最近录用了接受过政府训练课程的文职人员，以及几百名学生利用奖学金前往国外、特别是前往印度尼西亚学习，促成了这些挑战。

能够十分准确地确定资源差距的两个领域是安全和执法领域。自从我去年 11 月在安理会发言以来，自防务捐助会议在帝力市召开以来，建立东帝汶防务

部队的进程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防务立法草案已接近完成，招聘工作正在进行。今后几天里，很可能是 2 月 1 日，游击队-东帝汶民族解放组织武装部队——将不复存在，将由防务部队取代，东帝汶民族解放组织武装部队将成为防务部队的核心。随后将开始对由 600 人组成的第一个营进行训练，估计将于年底结束。这是历史性的新开端。

然而，三年后该部队才能达到 1 500 名正规兵和 1 500 名后备人员的全员编制。因此，在这之前很可能是相当多的国际维和部队继续存在。此外，安全局势、尤其是边界地区的安全局势也会影响我们精简的速度。

在安全理事会 11 月代表团访问以来，安全方面出现的发展给人以希望。和解继续取得进展，尽管进展还不够多。在印尼政府和东帝汶过渡当局去年 11 月以来赞助的各种主动行动中，有赞成自治的领导人和西帝汶的难民对东帝汶的访问-我们称之为“走访”，还有以帝汶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和其他东帝汶人为一方和以 Unit Timor Aswain (UNTAS) 为另一方的登巴萨会晤。我们希望这些发展最终将促使很多难民回返。然而，在我们向赞成联合的领导人首先作出表示后的一年里，我们仍在等待看到真正的收获。因此，我们怀着现实主义的态度继续寻求建设性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去年 11 月访问东帝汶和西亚的安全理事会代表团提出的一些建议，印度尼西亚政府已经接过去。在雅加达开始了对被指控在 9 月 6 日在阿坦布阿挑动和亲手杀害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3 名同事的人的审判。目前，两名主要军事指挥人员、包括去年 7 月底和 8 月初杀害我们两名士兵的主嫌犯，已经在押。印度尼西亚检察长马祖基·达鲁斯曼期望，新的人权法院将于今年 2 月开始审理第一批控告军事人员、警察、民兵和东帝汶前民事当局的案件。此外，民兵由西帝汶向东帝汶的渗透已经停止，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军队于去年 9、10 和 11 月采取了有力的行动和雨季的到来。

然而，印尼军方在边界另一边也采取了措施。我个人欢迎印尼新任地区军事指挥官威廉姆·达科斯塔少将采取的坚定措施。两天前我同他在登巴萨举行了有成果的会晤，我非常希望这些将会导致地面上发生重大和持久的变化，包括使所有依然活动的民兵全面地停止行动。这是东帝汶实现安全的先决条件，也是我们具备精简维和人员能力的先决条件，也是人道主义和其他国际工作人员重返西帝汶和难民自由地决定是否返回家园的先决条件。

此外，根据安全理事会代表团提出的采取措施确保双边机制能够运作的呼吁，已安排在今后几天内，更准确地说是在 1 月 30 和 31 日举行对由于印度尼西亚向东帝汶移交管制而产生的问题的谈判和联合边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我们希望并期待这些会谈取得具体成果。

若泽·拉莫斯-奥塔刚刚访问过雅加达，在这方面他可能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是，东帝汶对于一个稳定的将来的最大希望莫过于同印度尼西亚能够有安全的陆地边界，莫过于同这一邻国能够建立持久的友好双边关系的架构，这一点我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没有领土安全的基础，东帝汶就得继续从更重要的任务方面调拨十分紧缺的资源。

在执法方面，我们也期待今年以后很长时间里还会需要国际援助。即使落实了加速训练东帝汶警察的措施，我们仍估计警察部队在 2004 年底前不可能独立的进行工作。因此，需要国际民警在此之前继续执行当前执法职能和为东帝汶执法官员——尽管人员数目会议越来越少——提供训练的任务规定。

在这方面，或许应该提一提我们在这种维和行动部中部署和使用民警资源的方式。在这些行动中，民警具有主管人员的治安责任。根据我在科索沃和东帝汶的经验，我越来越认为在这些复杂的行动中民警的效率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现在是我们考虑办法改革当前做法的时候了。我知道我的维持和平行动部的同事们正在考虑这一问题。

最后，人们不会仅仅根据东帝汶过渡当局重建了多少学校和修缮了多少屋顶，或仅仅根据它组织选举和维持和平的好坏如何来衡量它，尽管这些成就都很重要。人们还要根据东帝汶过渡当局是否成功地帮助东帝汶人民完全实现独立，成为自己的未来和东帝汶民主独立国家的主人，来衡量东帝汶过渡当局。当然，独立远远超过一个政治性国家的出现；东帝汶人民非常出色地表明，他们在思想上和精神上一直是独立的。但是，这也是一种进程，而东帝汶过渡当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东帝汶过渡当局之后，在我们所有人对这一事业作出所有这些投资后，我们应该继续参与帮助东帝汶的这一进程，使东帝汶成为我们希望的那样，即成为整个地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进步和稳定的一个因素，这一点非常重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比埃拉·德梅洛先生对我和我国的赞扬。

我现在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马克·马洛赫·布朗先生发言，安理会根据暂定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他参加会议。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洛赫·布朗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本月主席。今天能够在各位面前发言，促进这场关键性的辩论，我既感到非常高兴，也感到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辩论。我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署长和联合国发展集团主席身份指出，目前很少有象帮助东帝汶充分立国这样的重要事项更能考验联合国了。

正如秘书长特别代表所指出，在这场考验中，联合国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也学到了一些惨痛教训。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特别向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致敬，他的领导坚强有力，展现了个人的坚定决心，以帮助指导该国度过这段非常困难的过渡时期。我们作为他的同事，以他为荣，但对他的成功，我们不感到奇怪。他的领导才能是联合国系统作出坚定和协调反应的关键。安理会知道，自 1999 年 9 月以来，联合国各人道主义和发展机构一直在东帝汶积极开展

活动。目前，9个机构——开发计划署（包括联合国志愿人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项目事务厅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仍然在帝力活动。正如塞尔希奥客气地指出，联合国发展协调员领导的联合国国家小组得以——我希望——提供积极的资源和支助，帮助处理向独立过渡的第一阶段各项工作。

正如刚才所概述的一样，现在，我们面临更严峻的问题。我们如何以最佳方式，支持帮助东帝汶走上强劲和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进程？我认为，答案就是借鉴联合国各人道主义机构和其他机构通过其活动建立的坚实基础，这些活动包括负责约175 000难民回归和重返社会，负责向180 000脆弱人民分配粮食援助，等等。

我们已经开始建设紧急救助与长期重建和发展之间关键桥梁的工作。联合国各机构和方案与各发展伙伴——包括非政府组织——合作，已经投入约13 600万美元，满足短期需要，而且同时开始为未来建设实际能力。迄今为止，我们的集体成就包括为1 000多间教室重新铺设了屋顶；重新建立了开始运作的保健系统；修复了六座发电站和120公里的公路；训练了200名公务员，包括法官、公共检察官和公共辩护人，恢复了法院；对青年汽车机械师、电工和木工进行了基本训练，建立了新的就业中心；支助了60个全国性的非政府组织；以及通过500名联合国志愿人员传授了技术、行政和管理技能。

为了帮助指导今后作出政策性决定，联合国大家庭还详细评估了今后的发展需要。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正在进行一项贫穷状况全面评估，在实现独立时，开发计划署将完成一份全国人力发展基准报告。我认为，我们所有方面都在努力发挥重要作用，协调新发展进程，支持刚建立的东帝汶全国计划和发展署，帮助确保捐助界作出协调一致的响应。

但即使在回顾我们取得的成就之时，我们也应该坦承尚未做到的方面。联合国系统在东帝汶人民最需要帮助的领域却难以取得实际进展：建设体制能力，自己管理国家，自己满足人民的需要。对于拥有850 000人民、只有60名合格中学教师、20名医生和几乎不存在有效力的政府系统的国家，这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这正是联合国发展活动现在应该注重的领域，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的技能和经验，帮助发展健全的民主体制和强大的、问责制的公务员制度，而同时承诺，此后将作为充分的发展伙伴留下来。

这种建设能力活动是开发计划署特长之一，秘书长特别代表已经指定本机构为主导机构，建设能力，支助过渡时期行政当局。为此目的，我们已经与姐妹机构和其他伙伴协商，制订一项广泛的行动计划，以帮助东帝汶在关键领域建设能力，从直接支助，到过渡时期担任领导工作，到人力资源，到选举援助，到建立充分运作的司法系统。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议程，但我认为这是可以完成的议程。这为联合国系统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可以证明我们本着共同目标，以更加协调的方式，以卜拉希米报告的精神，可以对这种挑战作出反应。我们决心与捐助界、布雷顿森林机构、民间团体和其他伙伴密切合作，完成这个议程。

但是，我们以及安全理事会也必须面对下述事实：不仅今后的资金筹措仍然不确定，而且现在也没有为这种关键的、前瞻性的建设能力工作提供足够的资源。因此，在结束发言时，我谨促请安理会帮助找到新的办法，或调整目前的筹资安排，或作出新的筹资安排，以保证我所概述的问题不被忽略，而使这些问题成为——这些问题也应该成为——独立筹备活动的中心工作。

为目前的行政当局提供经费而不在建设今后的东帝汶行政当局方面投资显然是短视的，但是，坦率地说，在许多方面，这正是我们目前做法的写照。我们现在需要一个筹资和制订方案的战略，这个战略超越目前的经常性需要，为独立进行筹备。

我们的朋友和同事、东帝汶未来的外交部长若泽·拉莫斯-奥塔——我认为，塞尔希奥和我们都认为，关于东帝汶今后的需要和目标，在这个会议厅里，只有他才最有发言权——今天在这里参加我们的会议，他和他的同事们需要我们为明天提供支助，更胜于为今天提供的援助。帮助他们建设独立的东帝汶的人民和体制，任何其他任务都没有这项任务重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世界银行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太平洋群岛国家干事克劳斯·罗赫兰先生发言，安理会根据暂定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他参加会议。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罗赫兰先生（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我谨代表世界银行真诚地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邀请我们参加这次重要会议。我还谨表示赞赏秘书长的报告、秘书长特别代表的通报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刚才所作的宝贵分析，并请将此赞赏记录在案。

联合国和秘书长影响了我们将见证的历史进程，指出了东帝汶今后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道路。世界银行对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工作表示敬意。

东帝汶对于世界银行也很特别。在举行投票之前，我们已经开始与东帝汶人及其领导人和联合国秘书处共同工作。事实上，我们早在 1999 年 2 月就开始同他们一起工作。暴力爆发后，我们马上到了那里。许多成员知道，安理会第 1272（1999）号决议是在 1999 年 10 月 25 日通过的，1999 年 10 月 26 日，我们就同我们的联合评估团到了那里。从那时以来，我们一直关注着过渡进程，同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东帝汶过渡当局）和东帝汶人密切合作。

我想，可以公平地说，东帝汶的过渡进程有许多成就。最重要的是，该国已有高度的国内安全，特别是国际维持和平部队和当地居民关系良好。这方面，我要向维持和平部队及其前身——东帝汶国际部队所做的工作表示敬意。

我们已成功地恢复了政府的核心服务项目。我们已经开始长期重建方案，而且开始的比我们过去所看到的任何其他冲突后局势更快。这一点，我们主要归功于东帝汶领导人和东帝汶人民以及他们建设一个新国家的承诺。但很多也归功于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代表联合国所做的工作，归功于国际捐赠界和国际金融机构及联合国机关中同事们的合作。我愿再次就此正式表达我们的深切感谢。

我想，1999 年 10 月由我们的联合评估团开始的这一进程已经证明，在东帝汶人民、国际参与者和各国际组织之间有一种伟大的合作精神。是的，我们成绩不小。东帝汶进程按历史的标准，是一个很好的进程。我们已走上成功的道路。但我们还可以提高，而且我们应该提高。我们应该汲取过去 18 个月的教训，在走向独立的道路上走得更好。

虽然有这些成就，但是仍有社会和政治紧张。重建和恢复政府服务的工作未能始终满足人民的希望，人民有时感到不耐烦。有时，东帝汶人自己对进程未能始终感到是过渡成功所需要的那种主人感。让我们在我们的经验基础上再接再厉。让我们抓住机会提高。

我们银行正在审查我们的支助进程。我们想要找出哪方面可以改进，我们将同东帝汶过渡当局和东帝汶人一起努力，汲取教训，用于目前的行动和独立后支助的规划工作。这一审查将在几天后开始。我相信，它将提供宝贵的教训，供我们在 6 月于堪培拉举行的下一次捐赠者会议上讨论，象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已经提到。

让我指出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些初步教训，并让我对今天摆在各位面前的问题作一些回答。我想，首先，我们需要为过渡和独立后任务拟订一份明确和有结构的计划。过去一年忙于解决和应付危机局势。这样做——让我十分明确地说——是正确的，考虑到 1999 年 9 月及随后帝汶人和他们的国际合作伙伴所面临的挑战的严重性。

现在我们需要有比较长期的观点。东帝汶过渡当局-世界银行进程捐助会议本届概述了一些战略要素，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才能确定并估计出其他重要步骤所需要的时间。今后几周需要拟订这些细节，但我相信，我们已经能够找出该计划的一些关键特征。

这一计划需要尽快到位，以便调动适当的资源。它需要侧重少数几个关键目标，而不企图包罗万象。它必须是有所有的发展合作伙伴参加的一场协作努力。它必须有东帝汶人推动，有国际社会支持。它必须在东帝汶和国际政府工作人员、东帝汶人民和各发展合作伙伴中间广泛宣传和讨论。每一个人都必须理解将要采取的道路。最后，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已经提到，这一计划必须有强有力的管理监督，把文字变成实际的结果。

正如前面的发言者已经指出，行政管理工作对过渡至关重要。在基础设施与通讯被破坏和国家完全崩溃的情况下，建立政府职能用的时间比原来预期要长。这涉及在采购与征聘中遇到严重的瓶颈阻碍，但这些瓶颈障碍马上将被克服。

东帝汶过渡当局和新生的东帝汶行政当局需要一段时间发展一种方式，以联合工作和克服棘手的法律与组织问题，以提高效率。必须给第一届独立的蒂汶政府留下一个有有效的制度、干练的人员、作用和责任明确的行政管理机关，一个没有腐败和不适当的政治干预的行政管理，这对第一届独立的蒂汶人政府的成功至关重要。因此，蒂汶人在现在到独立这段时间内，就必须充分参加过渡行政管理，以确保现在建设的国家正是他们将来想要的国家。

顺利的行政移交将需要在今后几个月中，在人员征聘和机构与人的能力建设方面协同努力，以及很好地事先规划独立后的技术援助。

我们要认识到，真正的独立不仅仅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东帝汶的独立需要建筑在良好的财政管理基础上，收支平衡，以求长期可持续发展。它的中

央财政当局和它的国家规划与发展机构将是主要的驱动者，并通过它们提供今后的支助，以实现可持续性。这是布鲁塞尔捐赠者会议发出的信息。联合国、东帝汶国家领导、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双边捐赠者之间的合作以这一认识为基础。我们需要把政治、行政管理和经济规划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比选举后更加密切。

东帝汶需要一个能干的国家，它需要一套可持续的财政和公共管理架构。这方面的关键是尊重东帝汶领导人继承一个精简的国家的愿望。我们必须特别注意避免开展未来国家不能维持的资本项目。我们需要侧重一套明确的政府职能，各机构应该适应国家的发展阶段。我们不能重复机构泛滥的状况，象许多比较富裕和更发达的国家那样。

经济独立既适用国家，也适用个人。当我走到东帝汶各地区时，东帝汶社会各阶层人民告诉我，他们不要依赖援助，他们希望有机会工作，开始办小企业，出售他们的农产品。私营部门的恢复是关键。它是关键还因为，今后几个月许多国际人员的撤离将造成公共机构和城市服务部门失去一些工作。

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一情况，不仅因为它给个人带来的困难，而且还因为安全与经济联系。工作更多、农业产量更高、私营部门有力和一个运作的公共基础设施，都将有助于确保稳定的政治过渡。它将向人民显示，一个独立的东帝汶对他们有好处。

不利的一面是，与此相比，失业以及摇摇欲坠的基础结构将造成政治过渡的不稳定。为了理顺经济发展与政治过渡之间的关系，同步化对这个会议桌旁和国际社会的各方来说是关键性的挑战。

我们应与东帝汶领导人、东帝汶过渡当局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事一道努力，确保在过渡之前实施适当的经济刺激手段，加强在社会服务和核心经济基础结构方面的预算拨款。

今后一个月将是具有挑战性的。我们世界银行随时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除了我们的持续帮助

外，我们将与东帝汶信托基金的其他捐助者一道提供协助，以建立财政上可持续的公务部门、薪金和结构。我们将在反腐败战略方面提供援助，这对于营造稳妥的公共部门环境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将与中央财政机构一道努力，改进预算过程。我们希望东帝汶信托基金将参与一个机制，支助制定一个更加统筹和更有持续性的新政府预算。

在今后数月里，我们将与帝汶人、东帝汶过渡当局、联合国，特别是与东帝汶信托基金的捐助者讨论这方面的各种选择。我由衷感谢东帝汶信托基金的捐助者在过去一个月所提供的支助。我呼吁它们在今后一个月里提供更多的支助。

主席先生，我要再次感谢你为我们提供了这次在安全理事会发言的独特机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顾问路易斯·巴尔迪维索先生发言。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他发出了邀请。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尔迪维索先生（以英语发言）：今天有这次机会来到安理会这里，在这次重要的辩论中发表意见，令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众所周知，我们非常自豪地与联合国领导人一道，帮助东帝汶人在独立的道路上向前迈进，努力为确保东帝汶社会今后的福祉建立必要的结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在东帝汶所发挥的作用集中于帮助联合国东帝汶过渡当局（东帝汶过渡当局）制定一个宏观经济框架，指导经济决策和能力建设，包括发展机构和技能，从而确保经济政策得到适当实施，使提供给东帝汶的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而且其用途有适当的说明。

所提供的支持是具有高度专门性的。我们在我们所建议的战略下提供的支助跨越了整个政治过渡进程。我们的构想是建立一个能在独立后持久存在的框架，因此，至关重要的一项是，即使在头一个月，所设立

的任何结构都应是相当健全的，以便使之能够经受今后在过渡进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

货币基金组织将继续强调在整个人道主义救济初期阶段、其后的过渡时期行政当局以及今后独立的东帝汶期间制定连贯一致而可靠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我们将继续强调加强能力建设以及为私营部门订立适当奖励措施的必要性，因为我们坚信，富有活力的私营部门的发展将是增长和繁荣的动力，也是消除东帝汶贫穷的唯一可能途径。

在与各捐助方和民间社会成员不断进行协商情况下同东帝汶过渡当局、东帝汶人、其他机构、联合国各机构和世界银行一道制定的战略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确保有一个支付系统。继去年 9 月份遭受严重破坏之后，当地不存在任何银行系统，也不存在进行任何有意义金融交易的可能性。因此，这是重要的内容之一。我认为，我们已取得一些重大进展，它们将在今后若干年内继续得到保持。显然，它将受到持续监测，并需要得到进一步调整，以确保一切进展顺利。

确保适当宏观经济管理的战略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发展一个基本的财政框架。在这方面，重要的步骤是建立一个最终将成为财政部的中央财政机构，并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可持续的综合预算。这个预算就是国家预算。它不是摊款预算，也不是支助东帝汶过渡当局行动的预算。它是支助地方行政机构行动的预算。我们在这方面花很大的精力，但我们也扩大了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以确保我们能密切监测资源流入该国的情况，因为过量的资源会导致混乱。

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和重大的发展。它们已得到充分记录，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的网站以及设有网站的其他各机构的网站上都可以查阅到各种有关报告，因此，我不想详细谈论过去 15 个月来在与东帝汶不断接触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但我想谈谈我认为值得注意的几个要点。我在开始时已经说过，它们超越政治循环。

首先是采用一种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制定银行运作的框架。现在已经有两个银行在运作，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银行。目前已有一些有关设立微观金融机构的倡议，此外也有一些人对外汇机构感兴趣。

就目前而言，在货币政策问题上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在过渡期间所选用的货币是美元。对于是否应采用另一种货币安排来为自己的目标服务，这个问题应由今后独立的东帝汶政府来决定。

关于财政方面的发展，目前终于第一次有了一个临时预算。对一个冲突后国家来说，在行动一开始时就有一个临时预算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发展。它尚未成熟，但仍是一项指导方针，至少能帮助以一定程度上明智的方式来分配资源。它还要求责任分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随后，主要在澳大利亚和日本政府的协助下，中央财政局配备了人员，先向东帝汶派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预算小组，任期大约 15 个月。这些人已帮助发展一个非常全面的预算程序，现在我们即将开始讨论 2001-2002 财政年度的预算。我认为，这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提到了设计中的不足之处，需要解决，但需要时间和经验。此外，已发展了一个税务管理机构，正在执行与国务委员会协商并通过公开论坛讨论制订的一项政策。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已经取得某些进展。

我认为，关于参与和当家作主的问题，已经有了某些辩论；人们越来越受到鼓舞地看到，东帝汶人越来越有兴趣。他们正在作出更好的准备，在技术援助方面从捐助者那里得到支持，而且在征税制度、公用事业税收制度和其它方面，他们正在对向他们提出的各种备选方案形成自己的看法。

预算执行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因为这不仅取决于有一个预算，而且取决于支出机构。这要求做更多的工作。正如罗兰先生所表明，在采购方面有额外的困难。在执行方面的某些困难可望得到解决。然而，在金融和支付管理——由于没有真正的货币管理——

以及财政管理方面的这两个发展是鼓舞人心的。我认为，今后它们将需要援助，我们准备支持联合国直到行政管理移交给一个新的东帝汶政府，并且支持今后的东帝汶政府。

至于能力建设的发展，我们将首先集中精力使我们认为对经济管理关键的那些机构运作起来。我们已经提供全面的技术援助，而且我认为，我们从这一局势中得到的重要教训之一是，对如何管理这些机构、需要哪些职能、以及需要哪些人要有非常详细的蓝图。我认为，可以说，我们现在提出的是，对正在发展的其它经济机构，比如国家规划机构和经济部，照搬这一模式，因为极为重要的是，我们事先知道对专门知识，正在建设的机构的类型，以及目前和今后的需求必须做些什么。正如前面的发言者所说的那样，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创造事后难以维持的东西，特别是在外部的大规模支助开始减少的时候。

我们承认，建设东帝汶在宏观金融管理方面的管理能力的进程是缓慢的；这是一个相当专门的领域。这需要时间。我们正在努力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其它机构进行更密切的协调，尽量确保我们有一个系统的做法，使我们能够在今后的几个月里为宏观经济管理的这些关键方面配备合格的人员。我们已经在新加坡开始某些综合的课程。我们有一个区域性研究机构。我们正在努力确立在职培训的做法。我们机构推荐的所有专家作为其权限范围的一部分，都有能力建设的任务，在他们在东帝汶任职期间，他们都有责任确定和培训当地的同事，以期后者最终能够承担自己的职责，尽管我们预期在今后的几年在这些专门知识方面将需要持续的支持。

我们前面的重大挑战是什么呢？我知道，安理会主席希望讨论侧重于未来，但我认为回顾过去是重要的，特别是在我们关切的领域，因为我们并没有真的认为在独立接近的时候，我们必须改变调子，这是由于，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已经设立的机构在任何市场经济中都将需要的。我认为，正在发展的技能在今后也将是需要的。政策也许会改变，那么就需要发展

分析能力，并确保东帝汶人能够理解、采纳和接受建议，因为我们最不需要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是被强加的感觉。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采纳的任何东西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主动性而接受的。这一对话是重要的。它将需要时间。它将比我们更为熟悉的东西来得慢。但我认为，对话是重要的，我们必须容忍和耐心。

在经济领域，我们前面的挑战主要在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我认为，许多人以为在冲突后局势中谈论经济问题有时为时过早；但它从来都不会太早，因为通常发生的情况是，在做事情的匆忙之中，我们作出我们事后也许会感到遗憾的决定。比如，我们的主要关切之一是工资政策。在做事情的匆忙之中，我们有时希望雇用当即就能用的人员，我们有时根据尽量使合格的人尽快来帮助我们的目标来判断工资政策是否合适。但在这一进程中，我们也许扭曲了东帝汶未来独立政府的工资政策。另一种可能性是，我们开始的项目也许长期下去代价太高。这涉及到长期可持续性的整个问题。对可持续性提出问题从来都不会太早。我们对此非常关切。我认为，东帝汶面临的挑战将是不断地审查已经作出的每一项决定，不仅了解长期的利益，而且也了解未来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在与捐助者召开的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捐助者主动提出非常慷慨的双边援助，但我们正在要求捐助者尽量具体些，也就是它们现在愿意做些什么，以及不管现在提出什么，今后维持的周期性费用如何。

虽然我的朋友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说，预算严格的，但我认为，预算现实的，而且符合今天能够获得资源的情况以及该国中期的潜力。正是这一点迫使我们反复地问我们自己是否有某些东西今天有益而明天也许代价过高。并不是说这些问题将阻碍我们作出决定；我认为必须作出这些决定。

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持续不断地对宏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的可持续性放在桌面上。没有宏观经济稳定，我们就不能指望增长，我们也不能指望能够处理严重的贫困问题。

另一个严重的挑战是能力建设。我非常高兴地听到，正如我们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朋友所指出的那样，开发计划署的任务是处理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随时准备在我们擅长的所有领域与开发计划署合作，我们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联合国和我们在未来独立的东帝汶政府中的帝汶朋友们。

最后的重大挑战是给予私营部门充分的奖励。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个独特的机会，摆脱从印度尼西亚时代继承下来的传统的政府结构，那就是一个庞大的政府。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为了正确地鼓励私营部门的发展，必须做许多工作。我们在一些出版物中详细介绍了一些直接的步骤。我将高兴地向安理会全体成员提供这些出版物的参考资料，这些出版物也可以在我们的网址上找到。

我们认为，为了制定正确的奖励办法，现在需要不仅维持稳定和保持一种合理的财政预算和财政办法；而且重要的是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以制定仍然缺少的基本立法，并且不仅仅停留在立法的水平上。在这一方面，我完全同意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的看法，即执行法律同制定法律一样重要，因此，建立司法制度必须同立法同时进行。具体地说，我们对迅速制定商业法、劳工法和外国投资法的需要特别关切，因为没有这些基本的法律要求和框架以及保证投资者的权利受到保护，我们就不能指望得到适当的反应。

我们还非常感兴趣地注意在政治过渡中采取的办法。这也将是有助益的，因为政治不稳定也影响投资决定。但是，我认为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提到的两个重要的因素是参加东帝汶人的决策和立法努力。这些因素正在使该国可能走向何方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朗，这反过来正在给一些已经分析各种可能性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些保证。

我们认为，应尽一切努力正确地奖励私营部门主动行动。不这样做，我认为我们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政府将不得不承担一些我认为东帝汶人有独特的

机会决定不让政府承担的义务，这与传统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我再次真正地感谢邀请我向安理会发言。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随时准备继续与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我们的帝汶朋友们、联合国各机构、我们的姐妹机构世界银行和各捐助者合作。我们将高兴地回答任何问题，并且双边地讨论安全理事会任何成员可能提出的进一步问题，或者有必要的话作更加具体的通报。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大会主席哈里·霍尔克里先生，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在请霍尔克里先生发言之前，我要特别感谢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安全理事会发言。大会主席很少在安理会上发言。确实，我们的研究显示，发生这种事情的上一次时间可能是54年多之前，即1946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我请霍尔克里先生发言。

霍尔克里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同你一起向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表示慰问。

我很荣幸能够参加安全理事会关于东帝汶问题的这一公开辩论。主席先生，我要特别感谢你努力使我能够在安理会发言。我参加这场辩论是促进联合国主要机构和行动者之间合作与协调的努力的一部分。

我从2001年1月10日至17日对东南亚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访问了新加坡、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我是应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政府以及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东帝汶过渡当局）的邀请进行这一访问的。在东帝汶，我在帝力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在这些会议期间，秘书长特别代表和东帝汶过渡当局的其他官员向我详细地通报了东帝汶过渡当局的活动。我还会见了包括萨纳纳·古斯芒在内的地方政治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指挥官和民事警察专员。最后，我有机会会见了各联合国机构负责人以及地方外交社区代表。

除了在帝力的方案外，我还对苏艾——1999年大屠杀地点——进行了半天的访问，在那里，我听取了关于区管理处和西区维持和平部队各方面的工作。在苏艾，我同区咨询委员会成员和其他地方代表进行了讨论。

对我的访问的详细描述，包括所有会议的清单可在我的网址上找到。

首先，我要赞扬在东帝汶为联合国服务的男女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并赞扬比埃拉·德梅洛先生的领导。特派团地区在物资和政治方面的工作条件是非常艰苦的。至关重要的是，特派团应从总部那里得到一切必要的支持，以便克服这些困难。此外，在这项全面的联合国任务中工作的各联合国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对取得成功的结果是至关重要的。

我访问东帝汶的主要目的是按照我们最近关于卜拉希米报告的讨论，观察全面和复杂的和平行动如何能够在实地产生作用。这次访问使我得以亲自评估东帝汶的局势。

在东帝汶，当地人口的期望与可能对一个极为缓慢的建国进程的期望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这是冲突后局势中所共有的差距。它存在于基层一级，反映为我每天在苏艾所遇到的人们的日常关注，也存在于政治一级，反映为当地政治领导人日益强烈地呼吁为立即独立采取行动。

在一个其历史记录中从未享受过自决和民主统治的国家中，这种对立即解决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一愿望应当由于意识到建立民主体制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项复杂微妙的任务而有所降低。然而，我相信对其国家未来负有最终责任的东帝汶人民，将在今后几个月中记住这一点，因为政治日历使他们更加接近独立。此外，我相信安理会将在其关于该问题的审议中铭记这一点。

东帝汶社会面临的是正义还是和解的根本问题。政治领导人中间似乎具有实现民族和解的真正和可赞扬的意愿，在最大限度上包括现在处于西帝汶的前

拥护自治分子。同时，在基层一级有一大批人的观点是要求正义作为任何真正和解的先决条件。我认为，这些看法并非相互排斥。实现正义是建国以及任何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根本。那些对侵犯人权和对人类犯罪行为负有责任者，必须绳之以法。同时，应积极促进各级的和解。

尽管实现了值得赞扬的进展，东帝汶却需要国际社会长期的帮助和存在，继续维持和平并支持重建与建国。我们不能在时机不成熟情况下或没有充分准备的战略情况下撤出东帝汶。地方行政当局的帝汶化是关键，应加以积极推行。但它在近期内不能完全取代国际存在。

仍然需要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来确保人口的安全和该国的整体稳定。期望和计划快速撤出是不现实，甚至是不负责的。我还谨强调：必须使这一行动具有与其任务相吻合的资源，而且必须以分摊捐款来提供这些资源。我在这方面还谨表示：我支持安理会要求在使用分配给向东帝汶过渡当局这样的复杂维持和平行动的分摊资源中增加灵活性。我再次提请大会有关机构注意这一要求。

在西帝汶与东帝汶之间边界地区的局势，令人严重关切。尽管我没有机会访问西帝汶，然而我清楚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解除民兵的武装并把他们解散。这是关键的，从而使联合国能够返回西帝汶来处理难民问题。它也是不可或缺的，以便制止对包括妇女在内的平民人口的暴力。

我谨指出，在我于雅加达同总统、外交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讨论中，我得到他们合作及决心推动难民返回的保证。他们表示希望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难民专员办事处，将能够尽快返回西帝汶。我个人强调了严格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19(2000)号决议的必要。我还表示希望，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过渡当局之间的关系将继续基于 2000 年 2 月 29 日的联合公报以及 2000 年 4 月的《谅解备忘录》。我的对话人员也表示了他们对与东帝汶睦邻友好关系的承诺。同任何联合

国的和平行动一样，东帝汶过渡当局的成功取决于各方的充分合作。

最后，意识到东帝汶过渡当局的表现，我要强调迫切需要通过执行卜拉希米报告的建议而加强联合国和平行动。此外，我要强调安理会在通过其关于卜拉希米建议时所作的一个重要承诺，它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有关。安理会保证确保被赋予的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适合于当地的局势，包括像成功的前景、保护平民的潜在需要以及一些方面会寻求以暴力破坏和平的可能性等因素。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请下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我要本着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大使的精神，特别向圣心女修道院第七级表示欢迎——我的女儿希拉很自豪地成为该级的一员。我希望这些年青人的在坐——这些穿红色上装出现在公共场合中的年青女士们——将给东帝汶的未来带来良好的预兆。

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东帝汶负责外交事务的过渡内阁成员若泽·拉莫斯·奥尔塔先生，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而向他发出邀请。拉莫斯·奥尔塔先生，你的在坐本身就具有历史意义。迄今没有一位东帝汶的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我感到高兴的是，东帝汶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儿子、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里向我们发言。

我请拉莫斯·奥尔塔先生发言。

拉莫斯-奥塔先生（以英语发言）：我谨同所有其他人一道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首先，请允许我向在座的各位转动萨纳纳·古斯芒总统最热烈的问候，他对今天没有亲自来这里参加会议表示歉意。我知道不能很好地替代他，谨请安理会原谅。

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今天给了我在安理会发言的机会。我有幸地作为东帝汶过渡当局中负责外交事务的内阁成员并代表东帝汶内阁中我所有的同事们发言。

我谨借此机会赞扬秘书长发挥领导作用、对东帝汶表示同情以及坚定地致力于解决东帝汶问题。没有他和他的领导，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开会。我们感谢秘书长自 1997 年就职以来为东帝汶作出的一切。我记得他当时承诺，他将在他任职期间看到东帝汶的冲突得到解决。他履行了他的承诺。我们注意到并赞扬他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报告。

1999 年，他任命了他最得力和最信任的一名国际公务员作为他的特别代表。我们感谢他把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借给我们，并赞扬塞尔希奥的决心、耐心、勤奋工作以及最重要的是他的友谊。有人说，塞尔希奥自他承担起他的最后这项艰巨任务以来，已苍老了很多。他只比我大一两岁，但我必须承认他看起来比我老很多，很多，我为使他过早衰老向他道歉。当他在发言中提到内阁和全国委员会内充满活力、生气勃勃的讨论时，我知道他说得很婉转，使用英国式的轻描淡写的语言。他对我们非常客气。

因为这是自设立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东帝汶过渡当局）以来我第一次在安理会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向贵国政府、贵国以及安全理事会过去和现在的所有成员表达我们最衷心地感谢你们所有人在我们最近经历的最困难的时期给予我们支持、同情和坚定地采取行动。正是他们的集体同情心和责任感促使安理会迅速采取行动，从而结束了我国人民遭受的罕见的非公正和苦难。

我只错过了几天而未能在这里看的我们的好朋友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大使，我为此深感遗憾。他是东帝汶和联合国的真正的朋友。我们将怀念他横溢的才华、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领导才能。我们期待着与美国驻联合国新代表，无论他是谁，进行密切的和卓有成效的合作。

在我继续发言之前，请允许我介绍坐在观众席上的一个人。他的名字是格雷戈·史密斯。他只有 11 岁。他已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这真使我羡慕。他在七岁时就开始为促进和平而工作，他那时建立了他的第一个非政府组织。现在，他在美国以及在澳大利亚

非常积极地为东帝汶调动各种资源——教科书、医疗用品和维他命。我感谢他和养育了他的双亲。他的母亲为了用全部时间来执行他的计划而辞去了自己的工作。

1975 年 12 月 7 日是生灵惨遭涂炭的日子，自那时我们已取得很大进展。现已过去了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各种奇迹，各帝国纷纷崩溃；自由和民主壮大；东帝汶不再在战争硝烟的笼罩之下，而现正在从战争的硝烟中获得新生。

自东帝汶获得解放和建立东帝汶过渡当局以来已过去了一年多一点。为了说明我们至今已取得的进展，请让我告诉你一些往事。我在 1999 年 12 月 1 日回到东帝汶，是在流放 24 年后第一次回来。1999 年 12 月踏上东帝汶的土地时，我悲喜交加，感触万端：喜的是，我们获得了最好的礼物，和平与自由；悲的是，我们经历了如此无理性的惨重毁灭。

被摧毁的城镇的景象使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广岛、伦敦和德累斯顿的黑白照片。我于 1997 年访问了波斯尼亚。波斯尼亚被摧毁的程度触目惊心，但东帝汶遭受的摧毁就更加严重。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完好的东西。凡是无法掠夺和带走的都被有意破坏和摧毁。政府服务部门和基础设施荡然无存；公务员、教师、医务人员、半技工和无技能的工人都已或是外逃、或是在山区避难或是被作为人质抓走、成为伤残人或被杀害。没有一个公共服务部门在运作；没有一家小吃店或杂货亭在营业。1999 年 12 月，东帝汶的日历是零年。

一年后，我们走遍全国，访问城镇、乡村和地力贫穷的 bairros，同我们数以千计的勇敢的同胞交谈，他们谦卑、贫穷但有自尊，我们一再对自己说：“多么了不起的人民。他们应过得更富足。他们应生活得更美好”。但我们却始终告诉他们：“上帝赐给了我们最好的礼物。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奇迹。他给了我们自由。我们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但上帝不再创造任何奇迹。我们必须耐心；我们获得自由才一年。我们

尽了最大努力。”而我们的人民是通情达理的而耐心的。

许多国际工作人员达到了我们的期望和幻想，表现出真正的决心、正直和专业精神，但征聘文职人员的工作可再仔细一些，任务分配可计划得再好一些。许多浪费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过我们可以理解，时间紧迫和压力使那些负责征聘的人没有足够余地来更仔细地挑选。这种情况现已纠正，征聘工作已移至地力进行。

在许多战线上都已取得了很大进展。学校重新开学、葡萄牙提供的几十万册崭新的书籍送到了孩子们的手中。医院和诊所都在工作。数千名儿童接受了免疫接种。现正在努力防治肺结核，这一祸害在东帝汶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2000年，经济出现了15%的实际增长，不过我们知道这种增长是脆弱的。有1800多家公司注册，其中大多数是东帝汶人拥有的公司。已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开始关于帝汶海的谈判，并已取得进展。我们乐观地认为会在近期内达成协定。希望石油和天然气赚取的收入不久将流入东帝汶。

东帝汶过渡当局的建立推动了东帝汶参与过渡政府的行政、准立法和司法各部门。我们的同胞们逐渐承担起随着自决产生的责任。在全国有将近7000名东帝汶人任文职人员，遍布各行各业，包括警察、教育、保健、边界和海关工作，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

但是，下放责任并不够：必须给我国人民提供完成其任务的必要工具。正如负责内部行政工作的内阁成员、我的同事阿纳·佩索阿·平托12月在布鲁塞尔捐资国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培养行政干部、加强地方能力和开发人力资源的任务仍是优先工作，需要得到特别注意。我们认为，必须强调尽量征聘东帝汶人，但在关键职位上赋予他们权力也同样重要。

按我们的理解，继续让4至6个国际任职是不能实现帝汶化的。我们承认一些执着的国际工作人员做了宝贵的工作，但我们要求立即加强东帝汶的征聘进程，并为完成这项重要任务提供一切必要工具。

总的来说，在这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发展时期的困难，但东帝汶过渡当局和东帝汶人之间的分享权力进行得不错，必须解决东帝汶过渡当局和东帝汶过渡当局在体制和行政方面不明确的问题。我们正在努力处理这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坚持这项方针。我认为突然脱离接触和不利用东帝汶过渡当局所取得的成果不符合大家的利益。

此类维持和平行动对联合国和帝汶人来说都是新生事物，必须给予东帝汶过渡当局各种手段和真正权威，以便确保创建的体制结构能够在独立后继续适当有效运作。

我现在再谈一谈安全局势。

总的来说，东帝汶正在享有一个日趋稳定的时期，民兵的威胁已进入休眠状态。但我们不能沾沾自喜。驻守在两个最关键行动部门的葡萄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极为出色地履行了职责，因此给人民注入了信任与安宁。驻扎在敏感的乌库西飞地的约旦部队也通过把明智外交和传统军事姿态结合起来，表现得十分有效。

遗憾的是，正如各位成员都知道的那样，帝汶人去年曾同我们的国际朋友们一起，对维持和平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者在东西帝汶毫无意义的死亡感到难过。我们将永远怀念这些勇敢的士兵和人道主义工作者，他们为帮助我国人民付出了最高代价。我们深深地感谢维持和平部队努力确保东帝汶的和平与稳定。

维持和平部队已成为东帝汶过渡当局最成功的支柱，包括孟加拉国部队在内的所有部队都应该受到赞扬，他们为在我国残酷无情的雨季期间保持道路和桥梁可供使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东帝汶人仍是世界上最穷困人民之一，但他们的犯罪率仍属最低之一。新生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暴力并没有以许多人担心的方式爆发。这种相对和平应部分归功于各政党的成熟和责任感。

在法律和秩序领域，民警部门的表现仍有改进的余地，人们可以按国籍划线并以维持和平部队的同样

方式重新组织民警部门，我们认为，如果给某一既定国籍的成员分配指定任务和/或指定地区，而不是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专业培训形式和安全理论混合在一起，那么民警部门就能够更加有效。例如，葡萄牙迅速反应部队因其出色的敬业精神而赢得所有东帝汶人的尊敬。该部队是一个应在其他维持和平特派团推广和学习的样板。

我们认识到，在实现独立后，维持和平行动部队的现有实力将有所削减。但也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一些维持和平部队派遣国已作出保证，它们准备在必要期限内继续积极参与东帝汶事务。

联合国部队仓促撤出东帝汶将使这一进程受到动摇和干扰。但我们知道，国际社会不能无限期地承担东帝汶外部安全的责任；因此，我们已决定创建东帝汶防御部队。我们感谢安全理事会授权东帝汶过渡当局承担这项额外任务。由于事实上的东帝汶总统已经谈及这个问题，因此我将不进一步加以阐述。我仅要补充一点，防御部队是保证我国国家安全的唯一途径。我们必须继续向我们的邻国伸出双手，并建立区域伙伴关系。

在我们自己的人民当中仍有一些份子仍然拒绝接受全民协商结果。我谈的是仍在我国边界沿线积极活动并继续在西帝汶难民营恐吓难民的民兵。但是，根据大会主席所说的话，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促使所谓的自治派参加对话。但是，那些参与被控犯有严重罪行的人必须受到审判。总之，没有正义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和平。

在这方面，我们赞扬印度尼西亚检察长马祖基·达鲁斯曼先生大胆和正义地试图在印度尼西亚依法惩处那些在东帝汶参与煽动、怂恿、计划和实施暴力的人。

为了给受害者伸张正义，为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名誉并为了全面打击有罪无罚现象，我们必须确保伸张正义，而无论罪犯的权力和财富如何。

我们致力于继续愈合伤口和同我们邻国的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我的内阁同事马里·阿尔卡蒂里先生和我在我抵达纽约前刚刚访问了雅加达。这是我们作为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内阁成员第一次正式访问印度尼西亚。我们受到主人的热切接待。

我们同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总统、阿尔维·谢哈布外长、政治、社会和安全协调部长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住区和区域基础设施部长、检察长马祖基·达鲁斯曼、议会议长尊敬的阿克巴·丹戎和其他著名议员进行了真诚的会谈。

瓦希德总统向我们通报了最近就建立巴西和印度尼西亚联合伙伴关系以便在健康等若干具体领域协助东帝汶问题同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总统进行讨论的情况。我们对这一提议表示热烈欢迎，因为它来自一个近邻和一个遥远的国家，两者都是同我们分享共同历史的重要区域大国。

我们知道印度尼西亚许多地方的情况，即从最近暴行和镇压的历史向民主和法制的痛苦过渡。互相冲突的利益和包括离心势力在内的各种根深蒂固的阶级和集团在一个象印度尼西亚这样具有许多种族、文化和地区的国家发生冲撞，特别是在该国刚摆脱几十年军事统治政权之时发生这种情况，是完全预料之中的。

我们只能对这个骄傲的国家表示同情和声援。印度尼西亚人民有幸有一位杰出和道德高尚的人担任其总统。在危机和转型时代，各国都需要道德高尚和富有同情心的领导人。印度的圣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和南朝鲜的金大中就是如此，这只是提及的几个例子。

印度尼西亚之友必须加倍努力协助印度尼西亚及其领导人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总统继续推进迄今在促进改革与民主方面取得的进展。

我曾经是制裁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但我也在访问雅加达结束时在记者招待会上要求仍制裁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解除各种制裁，特别是在非致命设备方面的

制裁，这是向瓦希德总统的政府发出善意信息的具体办法。

我还要谈谈我们同印度尼西亚的努沙登加拉帝汶省的关系。我们同雅加达印尼中央政府的关系决定我们同我们的邻居努沙登加拉帝汶的特别关系。我们将努力恢复同该印尼省的关系，我们同该省有共同的边界，通道很多。

帝力与雅加达之间相互信任关系能够促成实现我们希望清除双方武器和边界开放的梦想，让人民、贸易、体育和文化交流自由开展。

我们准备邀请西帝汶的体育和文化团体来东帝汶访问。下一届阿拉弗拉运动会将是我们推进促进整个大岛和平进程的一次机会。我们今年将是第一次参加这一运动会，我们参加悉尼奥运会也是第一次，但我得承认，我们在那里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由于国际援助的对象是东帝汶人，所以西帝汶对东帝汶难民很抵触。我们应继续考虑瓦希德总统、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古铁雷斯以及澳大利亚总理亚历山大·唐纳在千年首脑会议上讨论的成立由各国组成的财团帮助东帝汶经济的想法。如果能够实现，这种想法对创造大岛的持久和平与稳定的条件有重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这会是一个很长的进程，不约而同都有这一梦想的人都知道，还存在着巨大的障碍。然而，我们印尼的朋友知道，我们应该敢于梦想，因为即使是最不可能的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我们人民的苦难仍然是改善印尼和东帝汶关系的障碍。我们有许多人还被迫被关押在西帝汶简陋的难民营里。然而，说句公道话，我们对印尼政府最近几个月努力阻遏武装团伙活动的做法表示赞赏。

西帝汶的安全局势有所改善，尽管我们仍然对难民营一再出现武装团伙感到关注。印尼当局应继续努力彻底解散这些团伙。

我们促请联合国尽早向印尼派遣安全专家组，以评估西帝汶的安全情况。西帝汶继续存在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者，那里的难民营继续存在武装团伙，对印尼自身的利益形成威胁。因此，我们认为，印尼当局当真希望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感谢印度尼西亚支持东帝汶最终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我们感谢所有东盟领导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我们表示了支持。

在过去一年里，萨纳纳·古斯芒总统和我几乎访问了所有东盟成员国。我们同特别代表出席了东盟部长会议。我们访问了日本、中国、大韩民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今年3月，我将率领另一代表团访问日本。

在我们邻近地区之外，我们希望我们能于今年同其他亚洲国家发展关系。我们还打算访问一些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

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先生详尽地谈到了政治议程。但是，我打算在安理会谈谈我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反映了全国委员会的讨论，反映了我同东帝汶领导中我的许多同事的讨论。

社会的各个阶层-政党、教会负责人和非政府组织-都出席和参与了全国委员会的讨论。这些讨论的一个共同主题始终是：每一个人都承诺非暴力，都承诺恪守民主的理想和法制。

必须作出一系列决定实现独立的目标，例如，应该有何种民主机构？我们该采用何种选举制度？解决对这些初步问题将导致东帝汶的第一次选举，内阁和全国委员会在目前政治辩论后将要得出答案。

但是，正如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先生明确指出的，在一些重要内容上的意见已经趋于一致。我们希望下月各方能够签署一项全国性协议。我们自己对全国协议的内容作过讨论，所以我想详细谈谈。

全国协议不仅包括我们承诺非暴力和接受多数人统治等重要内容，而且包括坚定地致力于人权和在

独立时签署某些重要人权文书。全国协议还包括某些重要的宪法内容。这对于向东帝汶整个社会和国际社会发出这样的信息非常重要，即：不论今年哪一个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存在着所有政党都承诺的根本性原则，这是不会改变的。这些承诺涉及我们对外关系和已在东帝汶建立的外国投资或独立前几个月将要进入我国的外国投资。无论选举结果如何，全国协议都是重要的，因为这一协议能够让每一个人在对人权、民主原则、对外关系、和解和外国投资作出庄严承诺后，参与政治进程。

全国协议将由所有方面签署，随后将举行制宪会议辩论和起草宪法初稿。制宪会议选举将于8月底举行。我们初步设想选举于6月举行，但许多朋友—联合国的专家—向我们建议说6月可能太早。初步的讨论使我们了解了时间的不够，我们已开始考虑将选举推迟到8月底，以便与人民选举两周年一致起来。

具有全面的权力的大会将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起草、辩论和表决宪法。我们还知道—我们的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看法一致—制宪会议不应重复一些国家推迟几个月甚至一年、两年或三年的错误。因此，我们所有参与东帝汶政治进程的人达成了初步的一致意见，即：制宪会议应该最多有两个月的时间解决宪法草案，它开始工作时就提出草案。

我们还认为—这是多数的意见—一旦制宪会议完成起草和通过宪法的主要任务，就应变成国家的第一届立法院。这在许多国家有先例，在这些国家里，制宪会议成为第一届立法院，因而使国家和人民不必在一年之内举行两三次选举。我们应该让这个选举机构决定后续选举的日期，包括总统选举和宣布独立的日期。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体现立法议会选举结果的新政府，一个临时政府。

我们知道，东帝汶虽然已经实现和平，但和平仍然是脆弱的。我们都负有巩固和平的共同责任；这不仅仅是维持和平部队或国际社会的责任。我们东帝汶人认识到，我们所有人都负有巩固和平的共同责任，以保证顺利地向独立过渡。

在结束发言时，我谨指出，我们正在努力建设过渡时期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基本框架。这些机构是所有强大民主国家的支柱，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在东帝汶加强这些机构。我们已经听到，货币基金组织、我们的开发计划署朋友和其他机构以及世界银行愿意提供帮助，在最近几个月里，我们与它们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和个人关系，这确实是一种对东帝汶特别有利的独特伙伴关系。我再次感谢他们所有人——感谢马克·马洛赫·布朗先生、詹姆斯·沃尔芬森先生和我们的朋友路易斯·巴尔迪维索先生。大家知道，在许多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不是特别受人欢迎，但无论巴尔迪维索先生所代表的是什么机构，他在东帝汶却赢得了每个人的心——虽然他不断向我们提出紧缩建议。无论他代表的是什么机构，我们都爱他。我们感谢所有机构，感谢今天发言的各机构，也感谢今天未到会的各机构。

我们非常感激国际社会——感激在座的所有人和整个联合国大家庭，感谢你们支助东帝汶的重建和发展工作。我们不得不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国家。虽然在东帝汶过渡当局领导下，我们取得了进展，但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们再次要求联合国保持与东帝汶人民的伙伴关系，使我国可以充分发展经济、政治和文明能力。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你们的持续支持，这样，我们可以在安全和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努力。只有在过渡期之后继续保留维持和平部队才能提供这种环境。这将使我们的部队有时间进行准备，承担起我国的安全责任。在联合国的持续支持和积极参与下，我们将通过这些考验，走出黑暗，迎来曙光。

主席先生及安理会各成员，我们希望在我国独立日，你们能够前来帝力，这将是我们的荣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安理会各成员发言。但在请各成员发言之前，请允许我指出，我们进行了非常丰富的意见交流，出现了许多重要的观点。从通报中可以明确看出，虽然这次维持和平行动被广泛认为是比较成功的维持和平行动之一，但仍然存在

着巨大的挑战。比埃拉·德梅洛先生承认，仍然有许多工作待做，我认为，这是他的谦虚，或许更重要的是，这是他的务实态度。在许多年的时间里，东帝汶人民将需要国际社会不断给予承诺，支持新诞生的东帝汶政府。

开发计划署的马克·马洛赫·布朗先生说，东帝汶需要我们支助明天更胜于需要我们支助今天。世界银行指出，我们必须为过渡和独立后的任务制订明确和有条理的计划。货币基金组织详细解释了为什么需要一个有耐心的协商进程，发展长期和可持续的金融机构和进程。大会主席霍尔克里先生指出，我们不能过早或在没有周全战略的情况下撤出东帝汶。最后，拉莫斯-奥塔先生也告诉我们，虽然他不希望联合国部队永远留下，但过早撤出将会给东帝汶带来困难。

简而言之，出现了许多重要观点，我们希望安理会各成员将讨论这些观点。

埃尔登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特别感谢你今天召集了如此众多的才俊，这不仅包括我们尊敬的通报人员——我非常感谢他们所作的有益和有见地的通报——而且也包括公众。今天有公众参加我们的会议，使我们感到特别高兴。

我谨与其他代表一道，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表达我国代表团对最近发生的地震的哀悼。

鉴于今天发言的名单很长，我将缩短我印好的发言稿。我还谨提醒注意，瑞典代表将在晚些时候以欧洲联盟名义在辩论中发言，我国代表团支持他的发言。

我们安理会许多成员一直与东帝汶有着密切的联系，自1999年5月5日协定以来，这种联系尤其密切。秘书长报告显示，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主席先生，正如你所指出，现在的优先问题应该是着眼未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最近几个月里，确实进行了努力，以加速向东帝汶人移交权力。

安全理事会通过第1272（1999）号决议时并未预见到帝汶化进程；坦率地说，这是秘书长特别代表远见和想象力的结果。而且，这个进程似乎进展顺利。联合王国认为，建立国民议会不仅在问责制和合法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促进建设东帝汶自治能力的关键。

对于所有这些成就和其他成就，我们必须感谢特别代表及其工作人员，他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出色的工作。我们还应该铭记东帝汶国际部队在该领土恢复安全方面所开展的非常宝贵的工作。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我想今天是澳大利亚日。据我了解，前东帝汶国际部队指挥官彼得·科斯格罗夫中将将被命名为澳大利亚风云人物，坦率地说，没有人更胜任这一殊荣。

但是，祝贺归祝贺，不应该因此而自满自得。因为在东帝汶过渡到独立之前和之后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若干方面，包括在改进基础结构方面，东帝汶人的期望没有实现。特别代表和大会主席的发言含蓄地承认了这一事实。虽然世界银行的罗赫兰先生告诉我们，东帝汶重建方案是历来执行得最迅速的方案，但却仍然不够迅速。现实地说，我们不可能满足东帝汶人民的所有希望。但国际社会必须更好地提供现有的资源。世界银行准备总结帝汶经历的主要经验教训，这是一件好事。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吸取这些经验教训。

我还非常感谢特别代表和拉莫斯-奥塔先生提供了关于选举和独立时间表的信息。东帝汶人民急于独立自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虽然建立新国家的进程并不简单，但不久将需要确切的安排。无论确切的时间表是什么，在年底之前实现独立就意味着完成这项任务的时间很短。因此，在未来六个月里，必须不断将权力委托给东帝汶人。与此同时，必须进行切实努力，通过发展和训练，向东帝汶人民传授技能，使他们为管理独立国家做好充分准备。

这将成为在东帝汶能力建设大任务的一部分，他必须成为东帝汶过渡当局今后几个月的优先重点。这方面，我希望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先生能从质量上，而非数量上，评估帝汶化工作的成败。这同若泽·拉莫斯·奥塔的发言是相关的。在培养技能和工作能力方面，而不是仅仅在填补职位方面，这一进程是否有效？

政治技能也将是重要。东帝汶不久将成为新千年的第一个新独立国家，它必须成为世界其它国家的一个光辉榜样。正如我们已从若泽·拉莫斯·奥塔今天的发言中看到，该领土不缺政治领导人。但是我们也需要把政治和宪法结构搞对了。首先，选举前的进程必须包容和透明；关于新宪法内容的讨论必须包括来自社会所有各部门的所有代表。

但是，东帝汶若要前进，它也必须解决它过去的问题。去年我随安全理事会代表团访问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时，我对司法制度建设进展的速度感到关切。正如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所报告，自从那时以来，把犯有侵犯人类罪行的人绳之以法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有益的进展。特别令人鼓舞的是，本周，东帝汶境内一国际法庭第一次成功的起诉了围绕 1999 的全民协商发生的暴力。但是，东帝汶过渡当局和印度尼西亚要做更大的努力，以确保司法程序保持可信和有效。东帝汶过渡当局和整个国际社会必须考虑好这一司法进程的日程，不能让它无限期的拖下去。特别代表已呼吁国际援助，帮助建设司法部门。如果他就能就此呼吁向我们提供任何更详细的新情况，我将不胜感激。而且，正如大会主席所说，为了配合调查与对严重罪行的审判，东帝汶国内必须开展一个坚决的全国和解进程，整个帝汶社会必须一起支持这一进程。这里我也将不胜感谢，如果特别代表或者拉莫斯·奥塔先生能介绍这一进程的发展情况。

东帝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他的边界继续存在的有形的安全威胁。正如秘书长特别代表和拉莫斯·奥塔先生所说，一个稳定的边界是东帝汶未来的关键之一。因此我们同意，尽管有今天向我们报告的

各种改善，现阶段不应削减东帝汶过渡当局军事部分；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今后一段时间可能继续需要有一支相当的联合国军事存在。

但是，光说安全措施必须继续无极于事。必须在减少安全威胁方面取得真正进展。民兵仍然活跃在西帝汶难民营中，这令人震惊。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大批真正的难民在难民营中继续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生活，并受到严重的恐吓，如安全理事会代表团亲自所见。

这一问题现在必须得到适当解决，不仅因为它直接影响东帝汶的安全和联合国在该领土的存在的今后结构，而且因为有迫切的人道主义需要的明显理由。

圣诞节期间成功的“回来看看”访问方案令人鼓舞，我们希望这能导致自发返回的增加。但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我们敦促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措施，立即充分执行第 1319 (2000) 号决议，完成计划的登记进程，为想要返回东帝汶的难民的返回提供方便。进一步的拖延将意味着继续剥夺这些难民的投票权，对将要进行的选举将产生严重影响。

主席先生，正如你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朝前看。我们认为很清楚，新独立的东帝汶将继续需要大量的国际支持。我们欢迎现在就开始规划一场后续行动的打算。东帝汶人已经并且应该充分参加这一进程。我们期盼尽快收到特别代表许诺的详细计划和今年稍后秘书长的下一份报告。我们已有时间和机会仔细考虑东帝汶过渡当局应如何从目前状态演变成一场新的行动，协助东帝汶人民在国际社会中安全有保障的取得他们应有的地位。这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所说，是一场真正的挑战。虽然资金问题不一定要安理会考虑，但是为了东帝汶人民，为了联合国本身，我们必须把它做好。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在我开始发言前，请让我向你一样，代表孟加拉

国政府和人民，就今天严重的地震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向我们邻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深表同情。

今天上午，我们十分感兴趣的听了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东帝汶过渡当局）领导人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马克·马洛赫·布朗先生的重要发言。我们感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的发言，介绍他们机构参与东帝汶的情况。今天上午我们听到了大会主席哈里·霍尔克里和东帝汶外交部长——如果我可以这一头衔——若泽·拉莫斯-奥塔的重要发言。他们已向安理会提供了有关东帝汶目前的局势——关于迄今的事态发展，以及更重要的是，关于东帝汶未来的有用背景。

我们特别感谢大会主席霍尔克里出席我们的会议，他的意见经过他最近对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的访问，为安理会以及整个国际社会今后的行动方向，提供了重要的内容。在东帝汶社会中，他强调正义与和解之关系的根本问题，有重要意义。拉莫斯-奥塔先生在安理会上敏锐和重要的第一次发言，我国代表团非常欢迎。

现在安理会两个月后再次审议东帝汶局势，是有用的。这段时间发生了许多事情，正如特别代表所介绍。特别是过去六个月期间协同努力，通过秘书长的报告第 47 和 48 段所阐述的一种坚决和新颖的方针，加快向东帝汶人民移交权力。

在东帝汶过渡当局在该领土上作业一年多之后，实现东帝汶独立的一份路经图现在正在悄悄但无疑的出现。秘书长现在的报告证明这一点。孟加拉国对将在今年下半年初期有效地举行自由和民主选举而采取的步骤，特别感到鼓舞。

然而，要东帝汶顺利实现独立过渡，还需要有一些重要的基础。首先是继续努力建立和平与安全。这不仅对长期的重建和发展，而且对难民的回返和安置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安全状况已有改善。尽管民兵的活动仍然令人关

切，但我们高兴地听到秘书长特别代表指出，民兵的活动已经减少。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有力和果断行动，民兵的暴力已得到遏制。在这方面，我们期待早日结束本月在雅加达一个法院开始的对 9 月份杀人行动嫌疑犯的审判。

第二项内容是难民的安全回返。在这方面，我们赞赏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展协调努力，与有关机构，特别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国际移徙组织密切合作。我们希望，最近大会主席在访问雅加达期间所得到的合作保证和有关方面的决心将促进并加快使难民安全返回东帝汶的所有努力。

我们欢迎东帝汶过渡当局与印度尼西亚政府上星期在西帝汶举行的会晤。东帝汶难民于 1 月 19 日进行的最近一次“亲眼看看”访问活动表明了有关各方的积极协作。

第三项内容是捐助者的有效支助。双边捐助者、国际金融机构和联合国各基金和计划署应早日履行它们对信托基金的承诺。我们希望，将于今年 6 月在堪培拉举行的捐助者会议会在这方面产生结果；它对于东帝汶的能力建设，尤其是治理、司法和基本社会服务方面的能力建设来说非常重要。秘书长的报告非常详细地对它们进行了阐述。在这方面，孟加拉国要强调必须重视以当地办法来解决帝汶发展问题。我们孟加拉国期待格拉米银行访问团于下个月访问东帝汶，以帮助帝汶人着手为消除贫穷和妇女增权扩能实施微型信贷方案。

最后，国际社会同样有必要在独立后的东帝汶开展持续的努力。正如所有人都强调的那样，完全必须让有效的帝汶化进程扎根。去年 11 月，秘书长特别代表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在这个会议厅中确认——秘书长的报告也指出了这一点——在东帝汶独立后的初期阶段仍将需要国际存在。秘书长强调指出，在诸如司法及防卫和警察部队等方面，仍将继续需要国际金融和技术援助。孟加拉国将继续在这方面作出微薄的贡献，以配合广泛的国际支援。

在东帝汶摆脱冲突，作为独立国家从事重建和发展的时候，为帝汶化进程提供有效支持是联合国的一项重大责任。作为安理会的一个成员，孟加拉国将继续支持这一进程。

主席（以英语发言）：由于现在已接近下午 1 点。我打算暂停举行会议。我们将在下午 3 时准时复会。

下午 1 时会议暂停